

# 容闳晚年的新探索

李喜所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南开 300071)

**摘要:** 容闳几乎是一位和中国近代社会前进步伐相始终的爱国人士。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赴美留学, 寻求救国良方。1854 年返回祖国后, 致力于改造中国的进步事业。支持太平天国革命, 参与洋务运动, 经过 18 年努力促成了第一批留美幼童的派遣。后又投入维新变法运动。晚年则渐渐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 全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本文在探讨容闳转向革命的过程和原因的基础上, 重点评述了容闳为辛亥革命鞠躬尽瘁的爱国情操。

**关键词:** 容闳; 晚年; 辛亥革命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6)06-0068-08

**作者简介:** 李喜所(1946—), 男, 河北涉县人,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兼中国近现代研究所所长。

70 岁之后的容闳, 基本居住在美国, 但他从来没有忘记中国的社会变革, 尤其关注孙中山的反清革命事业, 尽其所能为创建共和出力。如果说, 容闳早年支持洋务运动, 后有厕身戊戌变法, 参加改良派发动的自立军起义, 还基本是一个和平的改良主义者, 那么, 步入晚年, 他则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成一个革命者了。这种变化, 弥足珍贵, 反映了容闳一生与中国近代历史变革相同步的闪光的人生轨迹。本文在评述容闳晚年的思想追求和主要活动的基础上, 着重展现其矢志不渝的救国情怀。

## 一、转向革命

据容闳自己讲, 孙中山在 1896 年伦敦蒙难之后, 曾走访过他。<sup>①</sup> 可见他和孙中山早有接触。他往上海支持自立军起义时, 和容开一同前往。容开, 即容耀垣, 是容闳所带的留美幼童之一。<sup>②</sup> 容开早在 1891 年就结识了孙中山, 后加入了兴中会, 和孙中山引为知己, 为革命东奔西走。孙中山到日

本从事革命活动时, 他多次同往。这在日本政府跟踪孙中山等人的记录——《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革命党关系》中有明确记述。孙中山往欧洲等地进行革命活动时, 也与容开同行。容闳能和革命党人容开同往上海, 后来又经常在一起交谈, 从事活动, 表明二者在思想认识上有不少一致的地方,

\* 收稿日期: 2006-10-29

<sup>①</sup> 容闳和刘成禺的谈话中说:“孙逸仙自伦敦释回, 访予谈数日”。见《世载堂杂忆》第 115 页。所谓孙中山伦敦蒙难是指他被清廷驻英使馆诱捕, 后又在友人协助下脱险的重要事件。

<sup>②</sup> 过去的许多史书把容开说成是容闳的侄儿, 这是错误的。实际是容闳的堂弟。容闳的后代容启荣曾在台湾《中外杂志》发表专文指出:“一容闳与容开是堂兄弟, 而非叔侄”,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第四册“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中把容开(又名容星桥)称为“容闳老博士之侄”, 实误; 二、容开上私塾时即起名容耀垣, 留美时即用此名, 但他不大喜欢, 常写为(Yung Hog), 后即容开, 一直未改。

也是容闳倾向革命的一种标志。事实上,容闳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往香港避难时,就和不少兴中会员都有来往,和孙中山也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因此,有人讲他在上海自立会机关中“为孙中山之代表。”但他也不排斥康有为、梁启超。时人记云:“当时自立会一面接受康梁领导,一面又遥戴孙中山先生,称之为‘极峰’,均系通过容闳进行联络。”<sup>[1] (P243)</sup>这种现象说明容闳正处于改良向革命的转折之中。

当时,孙中山还没有识破康有为、梁启超反对革命的保皇真面目,极力主张和康梁联合,共谋反清革命。像容闳这样的长者,孙中山等革命派和康梁等改良派都是尊敬的。为了调和两派合作中的矛盾,革命党人谢缵泰<sup>①</sup>曾提议合作之后由容闳来当会长。后来由于康有为拒绝与孙中山合作,容闳也就无法充当他们互相调和的中间人了。然而,容闳利用香港革命党人经常出没的有利时机,常和兴中会的骨干分子交谈,感情慢慢移向革命党人一边。而孙中山等人也把容闳引为同党。1900年六七月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正在广州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很感兴趣,幻想和李“合作”,策划两广独立,推翻清朝政府。按孙中山的设想,如果策划成功,新政府的外交事务主要由容闳担当。不料事与愿违,孙中山的设想根本没有实现,他只好又到日本活动。十分凑巧,容闳这时也到日本去,且和孙中山乘同一艘轮船,船一到横滨,孙中山和容闳“即在旅社闭户密谈甚久。”<sup>②</sup>9月13日,他们又一块往东京活动。14日,容闳即乘船返回香港。据日本外务省弄到的情报透露,孙中山对容闳的评价很高,认为“容闳声望素著,富新思想,为实现改革中国计划曾恳切函陈李鸿章。”所以,同年10月孙中山计划发动惠州起义时<sup>③</sup>,把起义成功后新政府的驻外特使留给容闳来担任。所有这些充分说明孙中山心目中的容闳是自己的革命同志。

1901年春,容闳由香港到台湾游历,险些丧命,由此他反清的革命思想进一步坚定。

台湾当时已被日本占据,新任台湾总督为儿玉子爵。当容闳去拜见儿玉时,儿玉拿出一张清政府对容闳的通缉书,非常严肃郑重地说:“贵国闽浙总督前几天送公文来了,告我如果见你来到台湾,一定抓捕送往清廷。”

容闳一听,心内惊恐,感到此命休矣。但他毕竟是一位年过70、富有阅历的老人了,为了感化儿玉总督,他装作从容镇定的样子,不慌不忙地答道:“我现在已经钻进阁下的手心,无论何时何地,阁下

可随时抓我,领功受赏。不过我不怕死,为中国改革而死,死得其所也。”

容闳的这番话确实感动了儿玉,实际上儿玉也并不准备替清政府抓获容闳,只是以此来试探一下,所以等容闳话音刚落立即显出殷勤万分的样子,说:“容先生不要错误地将我看作清廷的警吏,请您在台湾安居,不必过虑,有我在此,任何人也不敢将您抓获。”

容闳这才一块石头落地,和儿玉友好地交谈了起来。当谈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容闳上张之洞要求对日一战的条陈时,容闳大胆承诺,仍不改变旧有主张,儿玉总督反倒佩服容闳有骨气,并邀请容闳顺道往日本一游,容闳以年高体弱为辞,婉言谢绝。最后,儿玉总督为了保护容闳的安全,特派四名卫兵,前后跟随,日夜护卫,容闳尽情地领略了台湾的大好风光。几天以后,容闳辞别儿玉,返回香港,对儿玉总督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对清廷的残酷无情更为憎恨。

容闳在香港寄居皇后饭店。由于思念家乡,曾回南屏村探望。此后,主要精力就放在支持兴中会的革命活动方面来。不少兴中会员,常出没于皇后饭店。革命党人刘成禺十分崇拜容闳,常向容闳请教,最后拜其为师。在刘成禺后来写的《世载堂杂忆》一书中,曾记有当时容闳和他的一席长谈,较清楚地展现了容闳此刻的政治见解。容闳说:

“予老矣,此去终老美邦,再见实难。吾子年少(指刘成禺),明白事理,中学既善,他日沉浸西学,必有造于中国。……予默观现时大势,及中国将来情形,当竭诚以授汝,汝其阐行吾志乎?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十三州独立,杀英税吏,焚英船货,其举动何殊义和团?彼邦豪杰巨人,

<sup>①</sup> 谢缵泰(1872—1937年),字圣安,广东开平人,出生于澳大利亚。后往香港,就学皇仁书院,关心时政,抨击清廷。1892年组织辅仁文社,1895年加入兴中会,并负责组织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仍努力为革命奔忙。著有《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sup>②</sup> 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革命党关系)卷一。

<sup>③</sup> 惠州起义又名“惠州三田洲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庚子惠州之役”,指1900年10月孙中山、郑士良等秘密联络会党在广东惠州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由于准备不足和清军镇压,起义很快失败。

八年战后,消除私见,能见其大,公定宪法,成立国家,乃有今日。中国下层愚氓,民气已动,将及于士大夫。清廷能乃诚信仁义,引导其动,可免扰乱;否则,必有大革命之一日。清廷既倒,继起者不能诚信爱人,则大乱无已时,而我不及见也。中国人善用计用策,观演戏自知,计策者,皆欺骗之事,此为中国各级社会相传之大病。孔子有言,不诚未有能动者也,欲动人不以诚,即有所动,为不诚之反照,非动也,乱也。孙逸仙自伦敦释回,访予谈数日,予亦以此义告之。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予勛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心志。他日见面,汝当助其成功。再谈时局之将来,中国能勃兴,日本则退居二位;否则,日本独握东亚霸权,欧美又岂能漠视乎?日人地小不足以回旋,必向中国扩张,其国性气小偏躁,终为欧美所疾视,自取灭亡与否,在日本能知进退耳。东亚主人,终在中国。汝等年少,好为之,日日有我为中国人之心,即日日应办中国人之事,勿为大言,只求实际,斯得之,言尽此矣。”(刘成禺《纪先师容纯甫先生》、《世载堂杂忆》)

这番话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容闳对义和团运动的想法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中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企求平民的支持;二是对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十分推崇,希望为反清革命贡献力量。这表明他在历史前进的洪流中,已经改变了他原来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而转向了革命。

容闳转向革命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去分析:

首先,是当时客观形势推动的结果。

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的年代,也是中国社会的转折时期。此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地位已完全形成,帝国主义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控制中国,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中国已到了“国将不国”的严重地步;但清政府不思救国,完全投向了帝国主义的怀抱,“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居然成了小朝廷的国策,他们不惜去充当帝国主义侵华的鹰犬,在“儿皇帝”的位置上苟延残喘,人民对清廷的不信任已达极点,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一天天激化。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制约下,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当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并未出现历史上常有的群众斗争一时的“低谷”现象,而是持续发展,愈演愈烈。尤其是1901年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涌现,吹响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号角,反清革命、“革命排满”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

潮流。容闳自然受到了这一潮流的冲击,受到了这种“大气候”的影响,较快完成了“改良”到“革命”的思想飞跃。

其次,是容闳思想发展的能动性升华。

同样是受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激流的冲击,容闳可以顺时应势,康有为等人为何逆潮流而动,抱住改良主义不放呢?这是各人的思想个性所决定的。康有为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又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西学,戊戌变法中与光绪帝等交往较深,还怀有一种报答“圣主”知遇之恩的思想,在学术个性上康有为总是自负少变,他的不能随潮流进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容闳则不然,他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新文化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意识则如水上浮萍,从未定型。而且作为一位华侨式的学者,他对清廷的认识较一般华人要深刻得多。他对红巾军起义的看法、对太平天国的评论、对清廷官吏的抨击,都显示了极大的开放和自由性。在和清廷一些官吏的关系上,他也较一般,不可能和清廷捆在一起。他的参加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是随波逐流,将中国变为美国式的资产阶级的“天堂”才是他一生追求的目的。同时,从19世纪50年代归国、70年代派留学生、80年代参与“百日维新”,到90年代被通缉而无法立足于国内,容闳一直处于不得志的状态,这种碰壁和失败,为他走向反清革命铺平了道路,为其公开站到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准备了条件。容闳的思想自然到20世纪初年合乎逻辑地发展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在行动上配合孙中山等人的反清革命斗争。

## 二、支持反清斗争

容闳在香港首先积极支持了革命党人策划的洪全福起义。

洪全福,原名春魁,字其元,为洪秀全从侄(一说三弟),早年追随洪秀全参加了太平军。太平天国失败后逃至香港,在外国轮船上当厨师,但和广东一带的会党联系甚密。兴中会员谢缵泰为了联络会党发动反清起义,在1899年11月访到了洪全福,由洪全福联络会党,组织军事力量。同时又和香港富商、兴中会员李纪堂<sup>①</sup>联系妥当,由他出钱

<sup>①</sup> 李纪堂(1873—1943年),原名柏,广东新会人,其父李陞留给他遗产百余万,1900年加入兴中会,后一直出资支援孙中山开展反清斗争。辛亥革命后曾在广东军政府任职,1940年曾任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后病死。

50万,解决起义的经费问题。于是在香港设立总机关,计划1903年1月28日在广州起义。为了求得容闳的支持,谢缙泰、李纪堂找容闳征求意见,容闳表示全力支持,并且敬佩谢的组织才能、李的慷慨捐助和洪全福的勇猛作风。容闳在听取了他们的详细计划后,提议要争取国际声援,尤其要取得美国的支持,而且自告奋勇由他来承担这方面的工作。由于容闳在当时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谢缙泰等人在讨论起义成功后政府的组织人选时“提议推举容闳博士为临时政府大总统”,结果一致通过。(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随后,即按计划开展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

1902年5月16日,为了争取国际援助,容闳由香港乘船前往美国。6月12日抵旧金山。《哈特福德时报》(Hartford Times)6月18日报道说:“容闳身着西服,毫无疑问地通过跳板,并由海关人员检查行装,缴付税金15美元后登岸。”随后他又赶往哈特福德,开始了各种联络工作。8月13日,谢缙泰致函容闳,让“他在美国组织秘密社团,并为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和支持而努力。”容闳收到信后,9月21日就复信给谢缙泰表示:“一方面,我自己作好准备;另一方面,我将尽我的能力满足你们的需要。请尽早将暗号和密码寄来。对于我们的通讯,这是不可缺少的东西。”<sup>[2] (P315)</sup>1903年1月25日,距原定的起义时间只有三天了,不料有人泄密,起义流产了。容闳和谢缙泰也一度失去了联系。

但是,容闳这时仍然到处活动,他和美国军事家荷马李(Homer Lea)和财界有影响的布思(C. B. Bothe)取得了联系,计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来支援中国革命。不过,他这时并未和革命党人挂上钩,而是和康有为、梁启超有联系。因为,当时容闳虽然倒向了革命,但也没有和康梁决裂。在他心目中康梁这时和孙中山一样在推进中国革命。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利用和容闳过去的旧关系,极力争取容闳的支持。早在1900年5月,梁启超不知从何处听到消息说容闳要赴美,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纯老来美,大善,可以为各处保皇会增力。”<sup>[1] (P231)</sup>1903年春,梁启超到美国游历,特意往哈特福德拜谒了容闳,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长谈。梁在《新大陆游记》中记云:“先生今年七十有六,而矍铄犹存,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策国家之将来,示党论之方针,条理秩然,使人钦佩。”<sup>[3] (P54)</sup>1905年康有为也在美国专程拜访了容闳。而容闳也曾想用财力和武装支持康梁。但是,康有为和梁

启超千方百计破坏革命,一味为清政府歌功颂德,在保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坚持革命道路的容闳不久就与之决裂了。

1907年,容闳与谢缙泰重新取得了联系。他在6月7日致谢的信中表示坚定地支持革命党人,在9月17日的信中还具体向谢缙泰“提出了一个促使中国革命成功的计划”。<sup>①</sup>1908年在给谢的信件中,对康有为等保皇党进行过严厉的谴责。1909年1月,容闳在致美国友人的信中多次指出康有为不可信任,已放弃了维新主张。尤其是他私吞了华侨为促进中国进步事业的捐款,使容闳非常不满,认为他这是“自己伤害嘲弄自己。”相反,对于孙中山,容闳则多次向美国友人宣传他是一位有理想、重实际的政治活动家,在广东有很大的势力,如果支持他,一定会取得成功。在容闳这样的鼓动下,荷马李和布思对孙中山发生了兴趣。容闳还向荷马李具体提出了一个支持中国革命的“红龙计划”(Red Dragon—China),容闳估计要10万支枪,1亿发弹药,用500万美元,荷马李则估计需5000万美元。此后,容闳即想方设法落实这一计划。

当时,孙中山正在新加坡。容闳曾多次和孙中山联系,争取得到荷马李和布思的支持。在容闳的帮助下,孙中山和荷马李、布思有了通讯联系,商讨借款支援反清革命问题。1909年12月22日,应容闳之邀,孙中山抵达纽约,正式和荷马李、布思进行谈判。随后,容闳又安排孙中山和荷马李、布思在洛杉矶(Los Angeles)附近的长堤长时间的商谈。可见,这次会谈的实际操纵者是容闳。1910年2月16日,容闳还致信孙中山,具体提出了四项建议:一、自银行贷款150万至200万美元作为活动基金;二、成立一临时政府,任用有能力之人来管理起义后所夺取的城市;三、任用能人统帅军队;四、组织和训练海军。这四项建议很好,但最关键的是要有活动经费。这一点,82岁高龄的容闳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一方面致函孙中山,建议慎重谈判;一方面在3月28日写信给布思,提出了具体的借款方案。这就是:借款总数为1000万美金,分五次付款,年利为15%,期限为10年。此后,容闳又收到了孙中山的来信,提出如果能向美国政府贷款1000万美元,可以答应这样的交换条件:将来如有一省光复,即委任美国财务管理人员为中国海关税务负责人,并给予几项工商业的专利权。这样,互

①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19页。

相都明确提出了交换条件,最后经过多次协商,孙中山和荷马李、布思大体达成了五项协议:一、借款总额定为350万美元,分四次支付,以充军费;二、在美国帮助下训练军官若干,以充实军事力量;三、由孙中山办理一个各省革命党代表签字的文件,作为借款的证据,并以孙中山的名义委任布思为革命党在国外的财务全权代办,具体办理向纽约财团借款事宜;四、暂停华南地区和长江流域准备不充分的各种武装起义,集中人力、财力发动影响全局的大型起义;五、筹备组织临时政府。<sup>④</sup>会谈完毕,孙中山就在美国展开新的活动,并致函黄兴进行下一步的部署。容闳作为这次会谈的策划者,当然感到欣慰和光荣。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并未执行,布思也没有借到一个美金。不过,从孙中山后来的军事行动来看,会谈对他是有影响的。例如他反对在长江流域发动武装起义,支持黄兴集中同盟会的骨干力量和主要财力,在1911年4月27日发动了影响巨大的广州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后不到半年,武昌起义就爆发了,清朝随之土崩瓦解。消息传到美国,躺在病床上的容闳惊喜交加。

### 三、向往南京临时政府

从1910年5月起,容闳由于年老体弱,经常病倒,后又身患中风,行动艰难。但他那颗炽热的爱国心并没有因病魔的缠绕而有丝毫的减弱。1911年秋,当他得到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后,心情激动,夜不能寐,很想为中国革命贡献力量。他一方面说服二儿子容甄槐,令他回国;一方面致信孙中山等革命派,表示热烈祝贺。此信虽长,但颇值一读。

诸位先生:

上天呼唤你们来领导这次了不起的大革命,它已经在短短的期间内,使满清政府不得不跪下求饶。

一方面,你们一直为遭受压迫和抑制将近三百年的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着想,呼求一个共和国,给他们自由和独立,以作慰藉。现在,你们已经把那些满洲人推翻,不管那些政治骑墙派的言辞可能多么漂亮,好像多么有理,也不能让他们把你们诱离自己本来追求一个共和国的坚定目标。他们会对你说:君主立宪和你们国家的过去情况更为一致,和你们的民族传统和习惯观念比较协调;有了

君主立宪,同时设立一个枢密院,由袁世凯这样的人当内阁总理来领导他,这样,保证你们在政治上会得到一切可靠的希望。

一点儿也不要相信他们这套。一点儿也不要相信袁世凯通过他的喉舌唐绍仪对你们说的话。你们可以断定,他们全是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是个什么人?难道他在1898年不是背叛了他的主人光绪皇帝了吗?难道要信任一个叛徒吗?他是最受外国驻京外交家赏识的人。他乘机利用满清皇帝的崩溃,披着形形色色的巧妙伪装进行抢掠,直到把卑鄙的大烟鬼庆亲王的总理职位拿到手之后,他的那条跛腿立即变好了,他能够动来动去,想要支撑住可恶的满清机器,再来接管中国,并由他来当司机,任其操纵。

难道可以信任这样一个大阴谋家吗?不,必须把他和满洲人一起撵走。他的“袁”姓应该从民族的姓氏族谱中删掉。他应当被打上叛徒的历史烙印,永远受到子孙后代的诅咒。

中国人民正处于自己主权的最高峰,他们一直呼吁成立一个共和国,而你们,他们的领导者,也一向支持这个呼声。民声即天声;听从这种声音,他们就对了。

但是,在我心中还有另一个微小的声音,需要断然自由。那就是:你们在中国处置满洲政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你们互相间应当比亲兄弟还要密切,紧密团结起来,这是绝对必要的。

在任何情况和理由下,你们都不应该互相纠纷,陷入内部争执和内战的深渊。

我无需向你们描述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悲惨后果。你们自己知道它们是怎样的。自相残杀的战争肯定会导致外国干涉,这就意味着瓜分这个美好的国家,而英明的上帝本来把她留给中华民族,以建立一个模范共和国。

想想你们的革命给你们和子孙后代开辟了一番多么壮丽的事业!

愿支配一切的神保佑你们,愿你们终于受神的感召,聚集到万物的主宰者基督教会中来。

你们忠实的 容闳<sup>①</sup>

这封信写于1911年12月19日,当时武昌起义的烈火已经燃遍了全国,到处是庆祝胜利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但在胜利喜悦的背后隐藏新的危机。一是袁世凯重新登台,从清政府手中夺取了军政大

<sup>①</sup>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24—325页。

权,向南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放出了“和平谈判”的烟幕弹,并由唐绍仪<sup>①</sup>代表袁世凯在上海与革命党人的代表伍廷芳<sup>②</sup>开始了议和谈判,当时争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sup>③</sup>其实袁世凯的真正意图是借和谈来麻痹革命党人,夺取胜利果实;二是大多数革命党人被这种表面的胜利所迷惑,产生了革命到头的思想,内部不团结,四分五裂,争权揽肥,有的甚至和立宪派<sup>④</sup>、旧官僚拉帮结派,大大削弱了同盟会的战斗力;三是帝国主义列强打着“中立”的旗号,暗中支持袁世凯,进行武装干涉,妄图扑灭革命烈火。这三点是导致辛亥革命后来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富于经验的容闳在信中全讲到了。他对袁世凯的和谈阴谋揭露得如此深刻;对革命党人内部的团结是那样的珍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忧心忡忡。在12月22日给谢纘泰的信中,容闳再一次提醒警惕帝国主义勾结袁世凯窃夺政权,他说:“目前使我焦虑的是:掠夺成性的列强在北京,将有压倒一切的权力左右袁世凯、唐绍仪一伙;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影响上海的制宪会议通过君主立宪,并以袁世凯、唐绍仪控制新政府。就简直如同满清政权重新执政一样糟糕。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而不应当由骑墙派和卖国贼掌管,因为他们让欧洲掠夺者干预我国的内政。”他还建议:“应该立即组织并成立临时政府,以便展开工作,并使社会秩序和治安恢复正常状态。”<sup>⑤</sup>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了上海,立即着手组织南京临时政府,促进民国早日建立。容闳得此消息后,兴奋异常,又致信谢纘泰,让他一定争取参加孙中山的大总统就职典礼,“并给我寄一份完整的内阁名单。”如果在典礼的时候见到了孙中山,“千万替我向他致以衷心的祝贺。请你告诉他,我的健康情况逐渐好转,或许会到中国来,参观参观这个新共和国。”容闳还深情地表示:“我希望能活到看见我的朋友当选下届大总统,他已经为中国人奋斗了22年之久。我真希望在没死之前,能够和其他所有革命领导人亲自认识认识。”<sup>⑥</sup>由此可以看出,容闳是多么渴望再回亲爱的祖国看一看啊!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随后他就致信容闳,请他归国任事,并寄去了一张自身的照片。信中说:

“容闳老先生伟鉴:当此革命垂成,战争将终,及仆生平所达之目的将达之际,遯闻太平洋对岸有

老同志,大发欢悦之声,斯诚令人闻之起舞。然揆先生其所以羁留至此之源,想亦因谋复满清之专制,而建伟大之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之幸福,致有此逃之异域,同病相怜,非仅为先生已也,即仆等亦尝饱受此苦。乃今差幸天心眷汉,胡运将终,汉族之锦绣河山,得重见于光天化日之下,仆何幸之!虽然,吾人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迄今已二百六十余年矣,而教育颓败,人民之蒙蔽,恐一旦闻此平等自由之说,得勿惊愕咋舌耶!以是之故,况当此破坏之后,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才智学识,练达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倘俯允所请,则他日吾人得安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悉自先生所赐矣。先生久离乡井,祖国萦怀,谅亦不致掉头而弃我也。临风濡颖,不胜鹄盼之至。谨此,并请道安。”<sup>⑦</sup>

这封信以诚相待,充满激情,容闳看后非常感动,并准备行装,立刻启程。但突然病势转重,卧床不起。

#### 四、埋骨新大陆

躺在病床上的容闳,仍思念着回国干一番事

<sup>①</sup> 唐绍仪(1860—1938年),字少川,广东香山(今中山)人,赴美留学归国后,主要从事政治活动。1900年曾任天津海关道,此后出任过外务部右侍郎、邮传部左侍郎等职。袁世凯当权后,为第一任国务总理,不久解职,在北洋军阀角逐中沉浮,1938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刺死。

<sup>②</sup> 伍廷芳(1842—1922年),号秩庸,广东新会人,生于新加坡,后归国。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返国后先在香港充律师,1882年入李鸿章幕府,办理外交。1896年后,出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成为有名的外交家。辛亥革命后,主要依靠孙中山开展外交活动。

<sup>③</sup> “君主立宪”本来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政体形式,在保留原来君主一定权力的条件下,基本由代表资产阶级的国会行使职权。但在辛亥革命时期,这个口号反映的是地主买办阶级的利益,旨在保留封建统治,反对革命到底。孙中山等人的“民主共和”则是要求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与“君主立宪”针锋相对,具有革命的进取性。

<sup>④</sup> 立宪派是1905年后出现的一个较为复杂的政治派别,以反对革命、要求清廷速开国会、建立君主立宪政治为奋斗目标。虽然其与清廷以及革命派都有矛盾,但和清廷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这个派别阻碍革命进程的消极作用是主要的。

<sup>⑤</sup>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23页。

<sup>⑥</sup>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26页。

<sup>⑦</sup> 《总理全书》之十,函札,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版,第335页。

业,不过他也清楚这只能是幻想。于是,他将大儿子容觐彤唤来,命他回国帮助孙中山,报效祖国。但容觐彤是美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已经安排了十分优越的工作,不大想回国。容闳又气又恼,责之曰:“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才,原冀回报祖国,今不从此务,惟小人利喻,患得患失,殊非我所望于汝者。”<sup>①</sup>在容闳这种强烈的爱国激情感召下,容觐彤一度回国,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职。

1912年4月,容闳病情日渐加重。21日与世长辞<sup>②</sup>,享年84岁。消息传开,令人悲痛。

1912年4月22日《纽约时报》报道说:“据4月21日康州哈德福城讯:过去多年在中国外交界极为著名的容闳博士,今天在他的寓所因中风去世,终年84岁。”

同一天,康州的《哈城日报》载文称:“身为学者、政治家以及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容闳博士,昨日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在他的沙京街二八四号寓所去世。他是上周一得脑溢血症后,一直昏迷不醒。去年五月,他已患中风,从此身体即感不适。……他对过去一年来,中国的急剧进步变动密切关注,因为他毕生曾努力于此目的。”

4月23日下午3时,在哈特福德的一所教堂举行了庄严而肃穆的葬礼,由和容闳交往40多年的老友吐依曲尔牧师主持,他异常悲痛,泣不成声,坚定而又断断续续地指出:如果容闳还没有老,“他一定会亲自参加革命,他的与生俱来的热爱效忠中国的光焰,绚丽燃烧,直到他生命的尽头。”<sup>③</sup>这个评论是十分中肯和得体的,也是发人深思的。容闳这样一位矢志使中国振兴的人,在中国却没有立足之地,他从事的事业几乎全以“失败”而告终,最后亡于异国他乡,以悲剧终结,近代中国历史演进中的不“公正”在容闳身上反映得太真切了!但这不能归结为容闳个人的悲剧,这是近代中国社会悲剧的反映。悲剧舞台造就了悲剧人物。

容闳的遗体始终没有运回祖国。吐依曲尔牧师将其与夫人克洛小姐合葬于哈特福德城的西带山公墓(Cedar Hill Cemetery)。至今,容闳夫妇之墓犹存。墓的前方有并排方石两座,上书姓名缩写,后方有方座圆顶高立石碑一座。碑上正面头两行英文刻的是“玛丽·克洛,容闳之妻”,“生于1851年7月26日,死于1886年5月29日。”下面三、四行英文刻的是容闳,“生于1828年11月17日,死于1912年4月21日。”碑面正座刻一英文“Yung”字,下绘一中文“容”字图案,左边底座刻一英文

“kellogg”。墓园水光树影,发人悠思。

1936年,为了表彰容闳的业绩,上海交通大学建立了“容闳堂”,树起了容闳的铜像,尚健在的当年留美幼童前来拜谒,表示深切的怀念。

1962年,在美国的中国台湾留学生和有关人员,往容闳墓地扫墓,称颂容闳是“我国一位著名之大英雄也”。<sup>④</sup>

1972年,中国台湾留学生征得台湾官方同意,在容闳墓地立了一块纪念碑,上书:

“先生字纯甫,德才朗识,淹博多通,为我国学生留学美国之第一人。归国后力主遣幼童留学国外,当轴者纳其言。1872年乃遴选学生33人,由先生携以赴美,遂开我国派遣留学生之先河,而中美文化交流,亦以此为嚆矢也。自先生初次携学生赴美,至今适届100周年。寻声考迹,想高躅于当年,振铎扬劳,播景行于终古,维兹俊哲,实系人思,爰泐碑文,藉申虔慕。”<sup>⑤</sup>

这半文半白的文字出自当时的台湾教育部部长蒋彦士之手,亦还言简意明,动人思绪。但由于没有认真查阅资料,将容闳所率120名幼童写作33名,即使是专指1872年所率幼童,也不准确,多了3名。这实在是不能原谅的错误。后来有几位学者指明了这一点,将原碑文的33名改为30名,还算知错即改,表现了对古人的诚心,对后人的负责。

不少外国友人对容闳也怀着深深的敬意,认为他是“现代文明中最重要的知名人物之一”。他“将被铭记,而且不仅是在中国。”<sup>[5](P173)</sup>1954年6月13日,耶鲁大学召开容闳毕业100周年纪念大会,鼓励青年学生努力发扬容闳一生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英国的苏尔(H·N·Shore)在评论容闳时指出:

“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不会是卑贱的,虽然从事物的表面上去看,这个国家也许有一些困惫与

① 据广东珠海市中山县南屏村中学校长刘东所提供的《容氏族谱》,手抄本。

② 关于容闳的去世日期有三种说法:容联芳在《容氏谱牒》中讲是民国壬子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即阳历1912年1月29日;吴相湘在《民国百人传》里说是1912年4月22日;高宗鲁在《有关容闳的史料问题》一文中经过多方考订,认为是1912年4月21日。综合分析,高宗鲁的意见是正确的,故采此说。

③ 《容闳与中美文化交流》,《容闳传记资料》。

④ 美国《库伦报》1962年7月9日。

⑤ 《传记文学》第三六卷,第三期。

后退的迹象。和西方的国家以及人们在过去半世纪内的巨大进步相比较,中国的景象是不能令人鼓舞的;但是我们应该记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文化是许多世纪以前的文化——那时英国和欧洲还在野蛮的状态之中。至于中国是否进步?它的人民是否在腐化之中?它的才能是否已经发展到了极限?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证实。从这些例子中又可以看到,中国自己拥有力量,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时,迅速给自己以新生,把自己建成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sup>[5] (P32)</sup>

这段话极为深刻和富有历史感、哲理性。近代中国能产生容闳这样的人物,就表明“中国自己拥

有力量。”容闳身上事实上凝聚着经过血与火锤炼的中华民族精神,而且近代气息更浓。

#### 参考文献:

- [1] 袁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2]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 [3]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 [4] 孙中山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5] 容闳.西学东渐记·前言[M].北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龙先琼)

## New Exploration on Rong Hong's Late Years

LI Xi-suo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Rong Hong is a patriot who keeps the pace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ry. He went to America to seek ways to save the nation during the Opium War, and returned in the year 1854. Since then he devoted himself to Chinese progressive causes. He supported the revolution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took part in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and made it successfully to send the first young children to America after his 18 years' effort. Later, he threw himself into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of 1898. In his late years he fought against the Qing Dynasty by trying all his effort to support the Nanjing Contemporary Government led by Sun Yetsu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cess and reasons of his devotion to revolution, and comments on his patriotic spirit of sparing no effort in the performance of his duty for the cause of the 1911 Revolution.

**Key words:** Rong Hong; late years; the 1911 Revolution

(上接第18页)

## Shen Congwen's Local

——Also on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Local Literature

QIN Xin-ju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Shen Congwen's local literature is a constituent of humanitarianism and of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common people aroused by the May 4th movement, which makes folk custom, tradition and various country life the important sources for his creation. Shen Congwen finishes the aesthetic construction of "natural humanities" in his local literature, and provides valuable clues for the questions between history and culture, country sensation and ration, and urban and rural. The present local literature should focus on the exploration of country problems, show concern to the peasant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 a "new moder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eek the ecological root of the land.

**Key words:** Shen Congwen; folk; nationality; modernity